陶渊明的归隐选择与文学书写
——“隐逸诗宗”的双向审视

梁 海 燕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晋宋时期各类隐逸形态中,陶渊明选择田园隐逸,乃基于个人深刻的生命思考。汉魏以来部分乡贤隐者重著述立德、身行体道,成为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思想基础与现实参考。渊明诗文中的择居书写、力耕思想与微言表达,均与他的隐处环境和终隐志向有关。作为隐士的陶渊明,以诗歌创作传录其隐逸生活,对诗学史、隐逸史都有不小突破。陶渊明推进了隐士述作的艺术审美,张大了隐逸诗歌的思想价值。“隐逸诗宗”评论传达出,兼具隐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陶渊明,其诗文创作是将隐者行道立德与艺术表达相结合的典范。

关键词: 陶渊明;归隐;诗宗;文学书写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1-0072-09

陶渊明一生最主要的身份就是隐士,颜延之作诔文时径以“南岳之幽居者”称之。但渊明实不居庐山而隐,与其时盛行的林泉隐逸相较,其退隐田园的人生选择,在晋宋隐士群体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经唐入宋,渊明文名得彰。宋元以后,其隐逸品节也每于政治峻迫之时备受推崇。但回到诗人本身,陶渊明究竟是如何思考作为一个隐士的生活形态和价值诉求的呢? 作隐士是个选择,如何隐也是一个选择。深刻理解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必须基于他的隐逸思考,由此方能走进他的情感世界。我们谈陶渊明的隐逸大都说他的后世影响,其实很有必要结合隐逸传统及晋宋时期各类隐士的人生,观照陶渊明“以隐为志”人生观念的形成。锺嵘谓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①,这一评语本身即包含诗学史与隐逸史的双重维度。

一、陶渊明归田隐逸之远源近因

晋宋时期,士人求隐及以何种方式隐逸是个人生大课题,许多士人有持续深入的探索。隐者虽以“避世”为导向,其行为仍需在特定场域展开。《尔雅》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②这一空间层次,同时昭示着主体与政治中心关系之远近,故历来隐逸多就隐栖之地归类。谢灵运《山居赋》有对这一问题的集中思考,序中说:“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四者不同,可以理推。”③除了谢灵运提到的四种,其时又有朝隐、市隐、通隐等多种观念。陶渊明虽无表达隐逸观念的专篇文章,但对隐逸史及隐士人生也有深刻思考。

收稿日期:2024-05-12
作者简介:梁海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① 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6 页。
② 周祖谟:《尔雅校笺》卷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 页。
③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 2004 年版,第 449 页。

与谢灵运一样，陶渊明也视岩栖之隐为最高境界的隐逸行为①。岩栖之隐，古有巢父、夷齐，晋世有孙登、张忠等人。若就“隐”之本义讲，此类“藏身”之隐最为彻底。陶渊明在《拟古九首·其五》中塑造了一位“辛勤无此比”的“东方士”，“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② 就是岩栖隐士的形象刻绘，该形象显然出自陶渊明对隐身修道方式的观察。“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可知渊明内心对其人极尊重，颇有向往之情。同处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十分感慨于夷齐“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读史述九章·夷齐》）的气节品格。但汉魏以来士人对现世生命的珍重，使陶渊明的生命形态已具多元取向。他在《和刘柴桑》诗中明确表示“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渊明之不弃人寰、不入佛门，皆可从中找到答案。

虽然不弃人世，但渊明真心求隐，对于游移于仕、隐两途的行为极不认同。晋人对朝市之隐有所标榜，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③《晋书·邓粲传》也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④纳“朝”入“隐”，意欲消弭仕、隐两派之处世空间，实是晋人通脱之论。渊明对于这种调和仕、隐的行为，内心极不认同，明确宣告：“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其九》）市隐者多现于乱世，怀德秽行，潜藏于邑民之中。如王莽时代的王遵就曾“侩牛自隐”，在集市上以平章买卖市价为生计。嵇康《高士传》撰录其人，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称王遵与逢萌、徐房、李昙“时人号之四子”，也曾关注此人。但渊明长于官宦门族，非矫激之人，故于辞官后再行移家至“园田居”，尽量远离了闹邑。江左以来，玄学自然观念流行，隐士们也不免希企名山大川，且游且隐。与陶渊明并称“寻阳三隐”的周续之，就是走通隐之路的典型代表，其人隐居庐山，兼修儒释道玄，又时而足履王庭。陶渊明有诗曰：“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从我颍水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说的正是周续之接受江州刺史檀韶召请，下山讲《礼》一事。陶渊明不入庐山，拒绝加入慧远白莲社，是与刘遗民、周续之的隐逸人生最大不同，也是他自主探寻生命哲学的表现。

陶渊明辞官彭泽令后，正式开启了隐士人生。无论最初栖身“园田居”，还是后来移居到近郊“南村”，这些居所都在城邑外的郊野农村。渊明勤垦开荒，躬耕陇亩，藉地之力为生。田园，早在汉代已经成为士人仕宦失意后的精神归宿。张衡晚年乞归还家，《归田赋》赋予了“归田”行为“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的精神史意义。陶渊明生当乱世，盛年归田，与张衡“乞骸骨”归家又不同。可以说，陶渊明以其深邃丰富的精神追求与文学创作，将前此涉及田园内容的“归”，延伸到“归田”之后如何“隐”的探索。与传统岩隐避世、朝隐处俗，以及近世之林泉高隐、不尚节峻之通隐者相比较，陶渊明选择归田隐逸是他个人独特而深刻的生命思考。

渊明“终死归田里”的隐逸行为，在后世士大夫中似成绝迹，但在中古隐逸史上并非没有参照对象。汉世以来，民间就有躬耕读书的乡贤名儒，其不应征召，可称乡隐。东汉章帝时人高凤，字文通，“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⑤ 声名彰著后，高凤力辞官府征辟。高凤一生生活在家乡，以农亩、教授为业，一度隐身渔钓。此类乡贤名儒，并无惊世高蹈之举，却能流惠一方，自树名德。与渊明同时代的学者范泰，读《高文通传》时特别指出高凤这

---

① 谢灵运虽认同“岩栖”为体道最深之隐行，鉴于实际生活之需，取“上托岩壑”与“卧疾养生”兼善之利，最终选择了更适合士族身份的山居隐逸。

②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7页。本文引陶渊明诗文，若无特别标注，皆为这一版本，不再出注。

③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0页。

④ 《晋书》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1页。

⑤ 《后汉书》卷一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8—2769页。

样的人就是“隐者”①。而晋初高士皇甫谧的隐逸人生与道隐思想,同样为陶渊明归隐提供近代参考。《晋书·皇甫谧传》曰:“(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②虞般佑《高士传》亦曰:“皇甫士安少执冲素,以耕稼为业,专心好学。……或多劝修名,士安答曰:‘居畎亩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势利而后名乎?’”③皇甫谧悉心经营陇亩园圃,以备生存之资,且视此为体道之境,甚至提出尧舜之道在普通人身上亦可实现。

陶渊明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对撰者自然熟悉。皇甫谧《笃终论》倡裸葬,言“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④ 渊明《拟挽歌辞》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自祭文》曰“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其俭葬、归宅思想均似近承皇甫谧。刘遗民临终前亦仿皇甫谧《笃终论》作《笃终诫》⑤,可见皇甫谧在东晋隐士群体中影响之广。入晋以来,“归田”的人生选择亦非鲜见。西晋士人鲁褒,有感于时风贪鄙,著《钱神论》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⑥,遂隐姓名,莫知所终。东晋寒素士人湛方生,或为渊明同乡前辈,亦有先仕后隐、辞官归园行为,《后斋诗》曰:“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⑦又《晋书·隐逸传》记载“世有隐行”的翟汤家,“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子庄,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⑧ 翟家亦寻阳人,可能与渊明还有姻亲关系。总之,汉魏晋时期一部分士人走乡隐立德、躬耕体道之路,实现生命本心的安顿,其思想与处境皆为陶渊明探索隐逸人生提供参考。

陶渊明的归田隐耕,还有深厚浓郁的怀古底蕴。中国的农耕思想很早就融入了天人同构的哲学体系。《易·坤卦·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⑨坤,代表地,谓地力之无穷。《礼记·郊特牲》亦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⑩地育万物,藉地之力以生,即为顺遂天道。渊明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诸如此类,皆为诗人怀古心绪的写照。渊明诗文称引沮桀、荷蓧颇多,赞其“相彼贤达,犹勤垄亩”,又曰“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劝农》)“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渊明重新论证农耕稼穑于政于民的意义,将其提升到“道”的意义层面。

以上综述中古隐逸形式及思想的多元存在,结合渊明自身探求,以见渊明归田选择的思想基础与现实参照。

---

① 范泰所读《高文通传》,当是前代所修《后汉书》或高士传一类所记高凤的生平事迹。范晔于《后汉书·逸民传·高凤传》篇末特别记叙并引范泰之论,可见对这种乡隐之人,晋人将之纳入隐士传统,有名德意义的特别认定。

② 《晋书》卷五一,第1409页。

③ 《太平御览》卷五一〇引虞般佑《高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2页。卷八二四又引《玄晏春秋》:“又好农桑种藏之事,且养鸡鹜,园圃之事,勤不舍力焉。”第3673页。

④ 《晋书》卷五一,第1418页。

⑤ 释道宣《广弘明集》载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文末注:“(刘遗民)先作《笃终诫》曰:‘皇甫谧遗论佩《孝经》,示不忘孝道,盖似有意小儿之行事。今即土为墓,勿用棺椁。’子雍从之。”《广弘明集》卷二七上,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缩印明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97页。

⑥ 《晋书》卷九四《鲁褒传》,第2438页。

⑦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3页。

⑧ 《晋书》卷九四《翟汤传》,第2445页。

⑨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页。

⑩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五,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38页。

二、基于归隐选择的文学书写

(一)栖居意识与择居书写

陶渊明是个栖居意识颇为强烈的人。所谓“栖居”,指对居所功能的要求高于普通居住,有着身、心两方面的休憩需求。渊明早年住在上京旧宅,此宅中有东窗、东园,广植花药松竹,尤堪赏玩。作于早年的行役诗多有归园之念,所说“园田”“旧居”“园林”“林园”“旧墟”等,皆指此上京旧宅。诗人回忆早岁家居惬意情状:“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逯钦立先生曾说:“陶渊明的前半生很像门阀世族王羲之一样,时常表现出对田庄别业的眷恋。”①早年赋闲期间,渊明也偶到城外田庄去,田间劳动产生的心灵愉悦,更促使渊明认真思考闲居旧宅与真正归田有怎样区别。

辞官归隐后,为便于耕田,陶渊明又从“上京旧宅”移家至野外的“园田居”,以求真正实现心、迹合一的隐逸自由。关于此事,钱志熙有详细考述:“渊明辞官、隐居,在当时都是一个事件。辞官是一个事件,隐居也是一个事件。隐居这个事件的真正的内容,就是归园田居。即从上京宅搬到古田舍中。这古田舍所在的地方,就是乡村了,是陶家的一个大田庄。”②这次移家对诗人意义重大,是渊明开启隐士人生新形态的空间转换,因此他在《归园田居》组诗中认真详细地描绘了园田居的内外环境,“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其二又曰“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及与邻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从地理方位、里巷布局与社交环境看,园田居都可称作远人之村,异于昔日旧宅之“华轩”。为表现这一隐居特征,诗人借鉴古乐府的铺排手法,巧妙地将汉乐府《鸡鸣篇》写太平景象的“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加以点换,转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写园田居所在的田庄农村,成功描绘了村野之趣。“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归田之愿达成,诗人在形体、精神两方面皆获重生。

南村,是陶渊明归隐后的另一重要居址。在渊明几处田庄中,园田居当是最理想的住所。惜乎数年后,园田居遭遇火焚,诗人不得不再次移居。南村“敝庐”比不得园田居“方宅”阔大,又因地近城郊,有不少白衣未仕者暂居此地。渊明在南村的家临近通衢大道,实际上不能完全免除车马往来喧闹,只能以“心远”来平衡该地并不十分“僻远”的遗憾。但无论隐于园田居,还是后来移居南村,总之陶渊明是尽量远离了城邑闹市,将身与心安栖于真正体现自然形态的农郊田野。《饮酒·其四》曰:“栖栖失群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基于栖居追求的择居意识,正是田园审美在陶渊明笔下得到深入发掘的重要内因。

(二)终隐之志与力耕表达

对于家资不够丰厚的人来说,归隐,首先面临物力维艰的困境。历来隐士的生存方式,随其隐逸形态而论,或采药名山,或努力耕织,或渔钓江海,或教授生徒。即便如此,在乱世灾年,隐士仍不得不接受官府的资给。据载隐士沈道虔,“居县北石山下。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时复还石山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③ 晋宋时期著名的隐士之家戴逵、戴勃、戴颙父子,并隐遁有高名。戴勃、戴颙兄弟二人曾隐居在桐庐县的名山中。戴勃病重时,医药不给,戴颙对兄长说:“颙随兄得闲,非有心于默语。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禄以自济耳。”

①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后附录一《关于陶渊明》,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22 页。
② 钱志熙:《陶渊明经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0 页。
③ 《宋书》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2291 页。

即告求为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① 可见隐士若无身养之资,经济不能独立,很难完全实现自由。陶渊明“学非称师,文取旨达”,不好为人师②,未广授生徒。所仰赖者,唯有祖传的几处田产。《归去来兮辞》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渊明此次求仕,本有“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预先打算。《宋书》本传的记载是,“(渊明)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③ 颜《诔》说他“母老子幼,就养勤匮”④,乃就其历来求仕概言之。在隐居前积累一些生存资本,实属正常。《庐山记》卷三《十八贤传》记载刘程之,“慕远公名德,欲白首同社,乃录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岁满弃去。结庐西林”。⑤ 这样看来,渊明求为彭泽令,“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的说法,不当完全视为开托之辞。

自从移家园田居,渊明就积极垦荒,争取扩大田亩以为终隐之备。“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今人读此句多以为渊明不擅长农事,但统观全诗及写作背景,似当解为诗人勤恳务农的一种铺垫。因杂草盛多,故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只有勤勉不怠,归田之愿才不致半途而废。“种豆南山”本身既是写实又是用典。汉代杨恽罢官还家,张扬地从事鄙贱的农事商业,斗酒欢宴,作歌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⑥自此,“种豆南山”不仅意味着弃绝仕途,且有一种甘与庶民为伍的傲气。渊明诗末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就是希望勠力躬耕,达成终隐之愿。田地、良苗、桑麻、园蔬等,遂与渊明建立起更为亲近的关系,构成田园诗歌的典型物象。渊明与园田居的邻舍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性刚才拙的陶渊明,不愿向督邮折腰,自称不谙世情,却在远离城邑的乡村发现另一种人情美。这是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桑麻农田,是质朴而亲切的交际话题。据亲眼见过陶渊明生活的颜延之说他:“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而彼时,上层社会名流们以谈玄论理为消遣,热衷观览名园山水。陶渊明选择耕艺为生,可能受到墨家思想影响。⑦ 从南村“田父”眼中观渊明之形象:“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孰不知陶渊明所信奉者,乃在“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基于力耕信念,陶渊明笔下的农家生活亲切朴实,正是他所追求的自然人生形态。

在陶渊明之前,隐士们或涉及隐士生活的作品,对隐者的耕田务农、日常生活少有触及,作为诗学的审美呈现更待渊明而完成。此点下文有详述。

(三)南村环境与饮酒诗的微言倾向

易代之际的隐士,某种意义上即与当权者不合作。渊明欲求终隐,除保持生活独立,还须应对势要者的揽请。饮酒,成为渊明内心独思及与外界对话的特殊场域。陶渊明诗涉饮酒概有两类:一是基于“酒趣”生发的生命思考,二是别有深意的饮酒场域书写。这里重点说后者。

渊明利用酒能沟通仕、隐两界的功能,在文学书写中,为某些敏感话题设置相对灵活的言说环境。移居南村后,渊明社交复杂起来,并且随诗人名气增大,意欲与之结交的人物也多起来,其中不乏官场人物,如殷晋安、颜延之,都曾为渊明邻曲。《答庞参军》诗说“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可见庞参军主动结交渊明心意。就连江州刺史王弘、檀道济一类人物,也都专门造访渊明。如何婉拒来自外界的好意规

① 《宋书》卷九三,第 2276—2277 页。

② “学非称师”当指渊明不好为人师。《晋书·范粲传》:“(范)粲高亮贞正,有丹风,而博涉强记,学皆可师,远近请益者甚众。”

③ 《宋书》卷九三《陶潜传》,第 2287 页。

④ 李善注:《文选》卷五七,第 791 页。

⑤ 《庐山记》卷三《十八贤传》,《丛书集成续编》第 21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564 页。

⑥ 《汉书》卷六六《杨恽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96 页。

⑦ 相关讨论文章有景蜀慧《陶渊明思想中之墨派倾向探源》,《文史哲》1999 年 2 期。

劝也罢、蓄意招揽也罢,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历来州府长官结交隐士,多为自树礼贤形象。但朝士与隐士的交往,并非都能达致和谐。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亦为两晋之际著名隐士。永嘉之际,方回“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① 当时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任荆州刺史,对方回“礼之甚厚。侃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门辄下而进”。方回有感于陶侃的情义,与之交往。后来王敦派遣王廙取代陶侃据守荆州。王廙欲立威名,大行诛戮,“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此也隐士,虽欲避世,最终却杀身成仁。这在隐士生存中,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葛洪《抱朴子·逸民篇》借逸民之口说:“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涂同归,俱人臣也。”②试图为隐士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寻找政治上的依据,无形中已经向当政者作出不得已的妥协。

渊明如何婉拒官方之试探、招揽,《饮酒》组诗有表现。《饮酒·其九》中招呼渊明饮酒的“田父”,与园田居“但道桑麻长”的近邻,显然不是同等身份的人。此“田父”劝渊明何不顺时做“高栖”之隐,“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岂非官方招隐之辞? 檀道济往候渊明,直言:“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或许在当权者,甚至“通隐”之流看来,渊明实在是“自苦”其身,如此隐逸非明智之选。陶渊明并未因之动摇终隐的信念,并且有所辩驳。《饮酒·十三》还设置了“一士常独醉”与“一夫终年醒”两个角色。此诗构意受屈原《渔父》篇影响。屈原以在世者为浊,独醒者为我,作为清醒者的屈原,最终怀怨自沉。陶渊明反其所指,讽刺醒者“规规一何愚”,而如我之醉者实为“兀傲差若颖”。躬耕生活虽然艰苦,但陶渊明毫不怀疑这是自己非常清醒的选择。隐于田的同时,渊明亦隐于酒。萧统看得很清楚,“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焉”。③ 陶渊明诗歌的微言政治表达,是其饮酒诗与后世大量和陶拟作最大的不同。

三、隐士述作在诗学审美上的推进

锺嵘《诗品》谓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然则其为陋评还是善评,历来存在争论。陶渊明作为隐士的德行,在梁朝建立后尤被推崇。《梁书·安成康王萧秀传》记载,萧秀为江州刺史,“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④ 这也是萧统悉心编辑陶集、推其为风教标杆的时代背景。萧统之爱渊明文“手不能释”,其弟萧纲也常将渊明诗文“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⑤ 但据萧纲的文学好尚,他读陶集所取者未必在艺术,或主要不在感悟陶渊明的文学造诣。锺嵘说读渊明文集“今观其文,想其人德”,此种据文求德的收获,正是齐梁文人赏读陶诗的一种方法。这样看来,“隐逸诗宗”评论所传达的,正是兼具隐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陶渊明,其诗文创作是将隐者行道立德与艺术表达相结合的典范。这一评语虽为锺嵘诗论提出,却是陶渊明在隐逸史、诗歌史两个维度上皆具推进意义的史实反映。

魏晋隐士中不乏学识渊博、长于著述者,但长于诗歌吟咏确实不多,这与隐士们恬静寡欲、遗落世情的生活方式有关。隐逸,本身是一种行为,并不具有天然审美属性。先秦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几位“隐者”,都是乱世中的卷藏之人。而士人一旦从官吏阶层退出,失去原有社会资源,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自食其力,或与庶民为伍,从事微贱行业。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有田可耕,尚有能力留

① 《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附方回》,第 1418 页。
② 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二“逸民”,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00 页。
③ 萧统《陶渊明文集序》,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一,第 613 页。
④ 《梁书》卷二二《安成康王萧秀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343 页。
⑤ 《颜氏家训·文章篇》载“(刘孝绰)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298 页。

宿客人。《庄子》中的徐无鬼“居山林,食芧栗,厌葱韭”,这类岩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往往清苦异常。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靠采摘野菜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隐士们在获得行为自由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生活优越感。老子、庄子对生命、自然的关注,强调个体心灵自由,具有与诗性精神相近的生命意识、情感抒发与审美思维。但就诗歌创作来说,主体仍须具备专门的艺术创造精神。

汉代文学中关于隐士诗歌的记载,与汉人讴歌生命的作歌意识无异。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完整书写了伯夷、叔齐的人生,二人“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①,这样的作歌行为,是汉人表达生命意识的常见方式,并非隐士独有。东汉梁鸿算是难得的长于诗咏著述的隐士,《后汉书·逸民传》载其与妻子“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又见时政不清,做《五噫歌》讥讽朝政。不久去适吴,避地东南,临行作《适吴诗》。至吴地为人赁舂,“潜闭著书十余篇”。死葬吴地。范晔将这些诗歌悉数收入梁鸿本传,再现了他作为隐士同时兼有诗学素养的人生形态。梁鸿留存的三篇诗歌均为骚体,《五噫歌》讽世,《适吴诗》抒发流离之感,《思友诗》因思念友人高恢而作。这些诗歌主题思想与一般文人诗没有差异,尚不具备隐士诗歌特征。而汉代抒发归田隐逸愿景的张衡,却又不属于隐士群体。

魏晋时期,包括诗学在内的士人整体艺术精神都有提升,隐士们通过诗文表达隐逸情志、抒发人生见解的现象渐增。《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董京,初于洛阳市中“被发而行,逍遥吟咏”,著作郎孙楚有心招揽他,董京答之以一篇近五十句的杂言体长诗,杂用多种句式,几近散文。内中言及“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岛为狭,静以环堵为大”②,颇有几分玄学格调,说理有余,而形象不足。董京还留下两篇四言诗,涉及“文质思辨”“回归自然”以及“遁世存真”等隐逸思想,可以视作陶渊明文艺思想的前源。③《晋书·隐逸传》又载公孙凤,此人“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弹琴吟咏,陶然自得”④。公孙永“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⑤。惜乎这些隐士们行踪无定,避世隐遁,无诗咏传世。

通过以上对汉魏晋隐士作诗现象的梳理,更能突显渊明笔下虽不甚多,却足为典范的田园诗歌中的物象美、人情美。渊明远承诗骚,溯流汉魏以来乐府、文人诗,对诗学传统有精深研习。这是陶渊明与以往隐士不同的地方,也是其能成为隐士诗人宗主的必备条件。以写农村邻里关系为例,《归园田居》其五“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本之汉人轻裘美酒、秉烛夜游的游乐思想,渊明袭其意而自铸词,竟成一派欢欣热闹的农家乐景。从隐士与农人交往看,农村人往往是被教化的对象,这也是隐士道德价值的重要体现。而陶渊明能以平等的眼光写与农人交往,“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渊明发现农村中的人情美,真正开辟了田园隐逸的精神美学价值,比之张协《杂诗》、左思《招隐诗》都是很大突破。渊明诗融兴寄于自然,创造东篱、黄花、南山、五柳、青松、幽兰、孤云、归鸟等一系列具有稳定内涵的诗歌意象,开拓了以朴素语写日常生活的艺术手法。而这些创造,都是在陶渊明选择的田园隐逸生活形态中才能展开,才有被书写的契机。

四、秉承隐士精神的文学“立言”倾向

隐士传统中,不乏著述立言现象,至渊明时代尤其如此。兹据《晋书·隐逸传》摘举数例:

---

① 《史记》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123 页。

② 《晋书》卷九四,第 2427 页。

③ 范子烨:《陶渊明与董京》,《文学遗产》2009 年第 2 期。

④ 《晋书》卷九四,第 2450 页。

⑤ 《晋书》卷九四,第 2451 页。

(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

(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

(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①

渊明虽无这一类经学、子学著述,诗文中却有明显的"述作""立言"思想。在文学史上,陶渊明以诗文写作将隐逸现象以及隐士的人生哲思充分展示出来,张大了诗歌的精神史价值。东汉时期,确有不少"深自隐绝",面对公府征辟"终不降屈"的隐士,韩康、矫慎、法真等皆如此。但这些人即使载入史册,后世之名德效应仍然有限。隐士之淡泊名利,与以名德影响当下,在实现途径上难免有些矛盾。司马迁曾深感"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②太史公奋笔为夷齐立传,著之于列传之首,以彰其隐士之志。陶渊明深受太史公影响,自觉构建文学作品中隐士的精神象征体,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也是渊明自传隐士人生的表现。袁行霈先生将陶诗主题的创新概括为徘徊回归、饮酒、固穷安贫、力耕和生死五个方面。③ 这五个方面,都是此前隐士群体实际面临、也深有感怀的问题,但渊明能形成有规模的创作,不能不说是魏晋诗学在生命主题上着力开拓的结果。

渊明早年间断出仕留下几首行役诗,每每念归园林。归隐后,不遗余力地将日常生活以事境入诗,颇有传录意味。尤其归隐后期,述作意识及传世思想还是较为突出的方面。这倒不是说陶渊明隐逸思想不够纯粹,一面说着"吁嗟身后名,与我若浮烟",一面想着要留名后世,岂不是自相矛盾的虚伪? 其实,理解陶渊明诗歌的述作思想,仍然需要回归他的隐逸形态。如前所述,渊明对于隐士身份有自觉体认,但他选择的隐居空间,是与市邑相对而言的田庄或近郊村落。若与弃世藏身之隐相对,渊明之田园隐逸倒是一种"在世之隐"。在世之隐,首先不离人世,通过一己之道德修行,流惠一方。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已然更加着眼于隐士的立德社会效应,褒赞大贤隐士在乱世中通过道德修行,惠及于民。天下无道,道即在我,实是将孔子走上层路线的"行道"思想,沉潜为一身所处空间。试看韩康之隐,避名于世,柴车幅巾,有类田叟④。马瑶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⑤ 这些人并非止于洁身避世,而是树德于民、宣教于世。再如前面提到的高凤,《东观汉纪》本有其生平记载,范晔在《东观》基础上,再加增补。特意于传后加论:

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 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⑥

这样的隐逸观念不仅与《史记》《汉书》有别,与晋宋贵族沙龙流行的林泉高隐思想也不同。高凤其人,在《东观汉纪》中早有著录,但不入隐者之列。故范泰读其传文,特别从隐逸传统论其独立取向。稍后,沈约《宋书·隐逸传论》对隐逸现象也有深入论述。沈约提出"隐"有迹、道两方面要求,以"藏往得二,邻亚宗极"为贤人体道之境,认为明出处行藏之道的境界仅仅亚于圣人。"义深于自晦",即道在我身,我即道体,沈约将此视为理想的贤隐境界。渊明于仕、于隐都有通透了解,最接近沈约"贤隐"标准。既

---

① 并见《晋书》卷九四,第 2433、2436、2453、2454 页。

② 《史记》卷六一,第 2127 页。

③ 袁行霈:《陶诗主题的创新》,《陶渊明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9 页。

④ 《后汉书》卷八三,第 2771 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三,第 2772 页。

⑥ 《后汉书》卷一一三,第 2769 页。

然“大贤自晦,降夷凡品”,作为晦道的大贤,正在俗世庶民之中,何必另标独行之迹? 颜延之论渊明之隐:“非直也明,是惟道性。”退隐田园的陶渊明,可作为在世处俗之隐的典型。

陶渊明利用组诗形式,将隐士生命最关切的问题做了集中表达。《形影神》组诗之结构设置,《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读史述九章》等等,都有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在《有会而作》诗序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旬日已来,日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曰:“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隐士们虽无意仕途,仍有穷途之感,付之诗咏即为穷困主题,而且是最近性命之忧的穷困。很多时候,“饥乏”产生的身体感受更为直切,坚守其志,可能就要直面死亡。《咏贫士七首》为古之贫士代言,同时也是陶渊明隐志笃行的精神誓言。

余　论

陶渊明选择居田隐逸,并以诗歌创作传录其隐士生活,在诗学史、隐逸史都是不小的突破。作为隐士,萧统《陶渊明文集序》说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①。“与道污隆”四字,可说是对陶渊明隐士人生的最高评价。长于诗学的陶渊明,复将隐士著述传统、“晦道”精神融入诗咏,使其书写隐逸生活的诗歌成为一种自觉的生命哲学阐释。这是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艺术美和人格理想性的最根本原因。“隐逸诗宗”的时论,当据诗学史、隐逸史作双维度审视。与陶渊明对观,谢灵运幽居山墅,于山水园林中表遗世独立姿态却隐志未果,名德受累。究其原因,陶、谢二人身份地位、政治环境固然不同,但谢灵运对于隐士的人生指向认识不够彻底,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Tao Yuanming's Choice of Seclusion and Literary Writing
——A Bidirect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Celebrity of Seclusive Poetry"

Liang Haiya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mong various forms of seclusio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东晋) and the Liu Song Period (刘宋), Tao Yuanming (陶渊明) chose to live a seclusive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choice was based on his profound thinking about life.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Wei Period (魏), some sages and recluses were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virtues by writ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Tao through physical practice, which became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realistic reference for Tao Yuanming in doing farming. In his poems, the description about selecting residence, the thought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sublime expressions with profound meanings were all related to his secluded environment and seclusive aspiration. As a recluse, Tao Yuanming recorded his seclusive life through his poem writing, which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history of poetics and the history of seclusion. Tao Yuanming promoted the artistic aesthetics of recluses' works and enhanced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reclusive poems. The comment about the "celebrity of seclusive poetry" indicates that Tao Yuanming, as both a recluse and a poet, was a model of combining reclusive morality with artistic expression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Tao Yuanming; seclusion; celebrity of seclusive poetry; literary writing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萧统:《陶渊明文集序》,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一,第 613 页。